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一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五期 ——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3a）

【各抒己见】	“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王绍光等
【往事非烟】	断崖夜斗杨人梗	郝 斌
【拒绝遗忘】	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陶东风
【研究动态】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刘家驹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各抒己见】

“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 王绍光 • 单世联 • 老 田 •

〔原编者按：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诤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

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東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我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

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在就是革命阶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五类”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夺权，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个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行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来。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要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头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次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之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开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着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枪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济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

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不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新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光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的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湖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是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样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

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三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作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寿，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大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很高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西内战》的人都知道，

“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对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汉，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鲁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运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个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的、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现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出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是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对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成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鲁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扬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考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其余两位是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关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

当总理》，内容只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个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左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单世联：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一是这些新思潮也好、异端思潮也好，为什么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读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和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也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烂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党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持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生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涤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联？

老田：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不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文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今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个中学生。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服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是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没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把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地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可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者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党？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部书记不一定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在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教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输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以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什么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释，他就自己来解答为什么。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们“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工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次，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个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们，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会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理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色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造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机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天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什么是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矿开始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其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的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新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 摘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

## 【往事非烟】

断崖夜斗杨人梗

· 郝 斌 ·

在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的第二天，住处门旁的砖墙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下联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横批是“何去何从”。字写得涂鸦不说，更不讲对仗，

大概上下都是八个字的缘故吧，就凑上一个横批，把本来两句鲜明、响亮的口号，弄成了一副不三不四的对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三院门上贴出那副对联之后，满校园中，一时口耳相传，蔚为风气，对联成了表现革命热情的方式和手段。校长陆平家门的那副是：“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这是从毛泽东的律诗改写而来，不仅工整，读来也铿锵有声。（1）

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师，跟我同住19楼，他的门上也有一副，倒是相当工整，可惜，我只记得两个前半句：“说你臭，你真臭……”，“要多蠢，有多蠢……”；横批是“一头蠢驴”。不愧是中文系的学生，工则工矣，辱骂自己的老师也骂出了水平！相比之下，倒是历史系不伦不类的这副，用今天的话说，更“讲政治”。

门联之风劲吹，“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一语，也就常见于大字报和批判发言之中。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有一个机关报，叫《新北大》。1967年11月9日，该报发表题为《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的社论。其中说道：“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俱全的黑店。”

“王八”这个词儿入诗、入文，成为一种“雅咏”，以至两年以后的1968年，一位军宣队的负责人，原在某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处处长、派到北大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某，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讲“斗、批、改”的必要性时，他把这副对联，演绎得更为通俗和生动。杨处长这样说：“进了北大，才知道王八多得绊腿！”听他的口音，应当是冀中人氏。当他说到最后“腿”字，用他的乡音，拖个长腔，做tèi—éi，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读者朋友，“芳草萋萋碍行路”，斗、批、改的大道上，到处都是我们“牛鬼蛇神”一辈，说来真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到来之后，这里的“牛气”大增。次日，听得监管学生一声哨响，我们列队集合，由果树技术员老鲍下达劳动任务：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风见晒，来春栽树时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深、长、宽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土少石头多，碰上大石块，就算白干了，得换个地方重来。“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李白的夸张，可燕山的北风真是刺得人骨头缝生疼。才进入十二月，地表已经见冻，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刨不动了。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二十公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座谈“认罪心得”，从“二百号”方向走来一个人，模样不像当地农民。这是一个开阔的河滩，来人从进入我们的视线，直到走近，总要一刻钟左右。走近了，我看清楚是一位中年妇女，人很清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要穿过我们座谈的地方，径直走向后面的一排房子。监管学生高海林正在这里坐地为王，哪能容得她擅行擅入？当场把她喝住，问她何干。来说，她是北京市委的干部，此来是为取回彭佩云存留在这里的文件。高海林一听要取文件，不仅不许，反而令她交出钥匙。来说，那是北京市委的文件，要交，只能交给北京市委，语气也是软中有硬。高海林听了大怒，说：“你真是个死硬保皇派！到现在还给黑市委卖命！钥匙不交出来，你休想离开太平庄！你叫什么名字？”来说了她的名字。

原在太平庄参加半工半读的徐天新、范达仁后来告诉我，她叫黄。黄仍然不交钥匙，与高海林相持了足有一个小时。看那样子，瘦弱的对方如果是男性，高海林早就动手了。这时的我们，只是木木地站在那里，高海林可能觉得有伤他的威严，于是不再让我们奉陪，分配我们到山上去干活儿。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他在跟“黑市委的死硬保皇分子”单打独斗。果然，午饭、晚饭的时候，都看见了黄。她被扣了下来，当天夜里，睡在工具房。工具房本不是住人的地方，四面透风，又没行李又没床，既不得站，更不得卧，十月深秋，这一宿不知她是怎么度过的。

跨过上个世纪，到了2003年，我又见到黄。那是在西南联大65周年的纪念会上，联大的老学长们化妆登台，演唱当年的校园歌曲，黄即在其中。她的头发花白了，背有点驼，行动也明显迟缓下来。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太平庄头的那个黄形象，一点没有消退。

1966年国庆节后，又有20多位历史系教师来到太平庄。

秋季将过，地里有一些该收获的东西，如蓖麻之类的小作物，活儿不重，可耽误不得季节，很需要人手。我们是一些干重活、累活的人，属劳动改造；来干轻活儿的人，身上多少也都有点碴有点砢，今天虽属“人民”范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跌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活计有轻重，问题论大小。他们呢，凡有机会劳动，都会抢着去干——干活儿劳动，无非是卖点儿体力，但可以躲开是非。他们因有“瑕疵”在身，常常弄得举手投足，都找不到地方。文革过后，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总把换洗衣物和必备药品，装在一个包包里，准备随时被揪，三年下来，过的是忐忑日夜、魂梦常惊的日子。他跟我说：“还不如你们，索性进了“牛棚”，反倒那个了！”在文革中，这种人哪个单位都有几位。

“小秋收”的活儿本来不多，以劳动换取苟安的人们，只在太平庄干了两、三天，再没什么可干的，就被打发回校了，可独独一个人被留下：杨人梗的妻子张蓉初。

张蓉初是历史系的副教授，生在常州，长在苏州，讲话细声细气，大家闺秀出身。她讲授的苏联史，只有坐在前排的学生才听得见。参加“小秋收”的队伍，本同我们“黑帮”分开劳动，可在出发、收工的时候，免不了在工具房前，同我们擦肩而过。张先生到太平庄来，固然也躲是非，主要的是放心不下夫君杨人梗。这个时候我发现，张蓉初的眼角，既要从我当中扫到杨人梗，又要极力避开我们。现在，夫君是看到了，不想自己又被扣留下来。她一位女性，一个人住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夜里山风一吼，她是什么感受呢？还没到夜里，留下她就有分教：让她参加杨人梗的批斗会。

杨人梗先生，湖南醴陵人氏。北伐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从广东出发，进入江西，矛头直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杨先生当时二十二、三岁，担任第二路军指挥部秘书，随军行动。此后，形势逆转，他改在中学教了几年书，后来赴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抗战初他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后一直在大学里教书，论职业，当然是一位教授。1949年1月，解放军将北平团团围住，蒋介石打算让傅作义为他火中取栗。这时的傅作义，实力丧失大半，有意放弃武力。1949年1月16日，傅在中南海邀集北平各大学的教授、名流聚会。傅作义说：“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在傅作义来说，固然成竹在胸，邀集座谈，意在放风，可这是他葫芦里的药，非贴身的僚属，无从猜测。受邀的杨先生在会上说：“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应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2〕

杨人梗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开山始祖。他本来专攻法国史，1959年，以法国史的功底转而去开垦原属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历史。仅五、六年功夫，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讲授基础课，并在教材的基础上写出了《非洲通史简编》。

杨先生在国内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中，著译皆丰，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讲课，有声有色，法国大革命一节尤其拿手。唯此之故，杨先生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打入“牛棚”，实是在劫之数，可当时执掌太平庄监改大权的学生高海林要他交代的，偏偏是一个“历史问题”。高海林没有指明什么范围，如党派、军警、还是特务？我们只能听，不能问。

那天，晚点名提前，批斗会在我们宿舍开场。高海林一个人主斗，我们一干“黑帮”也都在场。在这个场合，我们的身份算什么呢，是奉陪批斗？还是奉陪挨斗？批来斗去一个月了，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如今也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成为尴尬的一群。张蓉初呢，这个时候的她，要同杨先生当面锣对面鼓，她比我们更尴尬。

张蓉初与杨人梗结婚很晚，这是我们都知的事。此时，她一看在场的这帮都是熟人，倒是反应很快，她面对杨先生，以从来没听过的高分贝、手指杨先生说：“原来这件事你也瞒了我！你今天要痛快交代，才能求得人民的谅解！”意思是说给杨先生，高海林没从我口里掏去什么东西。杨先生完全会意，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斗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战果，高海林一怒之下说：“走！到外面去！”他把杨氏夫妇，加上我们一起带出屋，上了山，来到一个断崖边缘。高海林让杨先生背朝外，面向里，说：“你交代了，我放你回去；你嘴硬，我就把你推下去！”崖是土崖，虽不算深也有十几米。杨先生的一把骨头经得起一推么？他素有哮喘毛病，上得山来，一呼一吸，已是两肩耸动。不想，此刻的杨先生气喘吁吁，没有别的话，只是以手指心、将心托月，“一口供”，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杨先生对答高海林的那个神情，简直像在课堂上给我们讲雅各宾党的壮烈事迹一般。

高海林自从监管我们以来，断断续续也有个把月了，喝骂动手是常事不说，与别的监管者又有不同，做起事来，实在没深没浅，用北京话来说，他是个“二百五”——半疯儿。您想想，在这旷野荒郊，“牛鬼蛇神”如此众多的地方，他一个人就敢开个批斗会，还让众“黑帮”作陪，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吗？来太平庄小秋收的人群中，有位历史系的团总支书记，说起来，他刚毕业一年，只因高某看他不像是“革命群众”，就喝令他搬上自己的行李，住到我们这一伙里来。小秋收的带队人是位教师，不赞成高海林的蛮干，可拗不过他。这位副书记与我们为伍，觉得很是不堪，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将就着与我们一干“牛鬼蛇神”同吃、同住、同请罪，半个月过后，还是“系文革”打来电话，高海林才算捏着鼻子，把他放了回去。

话说那晚的悬崖之上，攻之者说有，辩之者曰无，双方僵住，收不了场。那高海林说的“你嘴硬，我就把你推下去！”这话我们听着是威吓，可谁也保不准他真的把手一伸，那么，燕山脚下、太平庄头，就会骨折魂销，成为杨人梗先生的大归之地。

有道是“狼众食人，人众食狼”。此刻偏是“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小将只一家的地方。直等到高海林喊得口干舌燥，我们一个人开了头，大家七嘴八舌齐声帮腔说：“杨人梗！红卫兵小将的话，是挽救你，你应当端正态度，老实做出交代！”尔后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连呼三遍，山谷回应，弄出一个可以终场的局面。至此，高海林悻悻然，也只好借坡下驴，默认了事，放了杨先生和张蓉初。这个时候，斗人的、挨斗的、以及我们一伙，只有小心脚下，齐回宿舍，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不清了。一路之上谁都没有话，也说不出什么话，高海林难免有几分尴尬。抬头只见缺月衔山，才觉得清凉入骨，回到宿舍，已近午夜时分。

我顺便告诉您，转过来，1967年，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教师三五成群，纷纷成立“战斗队”，战斗队各有名字，大都是从毛主席的诗词里挑出一个词儿，贴大字报的时候，就用它落款。比如“不争春”、“漫天雪”、“看今朝”、“慨而慷”、“缚苍龙”、“虎踞龙盘”、“浪遏飞舟”等等，不乏革命浪漫情趣。唯独这个高海林，不知是旁人不与他搭伴，还是他不肯与人为伍，寡人孤家，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叫“炮兵营”，干了不少隔山打横炮的事。周一良先生是高海林动手打过的人，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在周先生面前提到了高海林这个名字，周先生直口便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和折磨，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

尤其奇怪的是，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即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写的那个‘牛棚’——引者），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3）

时隔两个月之后，周一良先生改变了想法。不知道周先生是严于律己，还是首先反省自己的惯性发生了作用。他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之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接下来，周先生这样说：

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4）

这是一位86岁老人的话，一位宽厚长者的话，多么理性的话！无奈高海林同他的军师两个人，一位在河南，一位在北大，谁都没给周先生一点回应，直到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

高海林真的心如顽石么？听说，高海林在他执教的学校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口碑不错。我遇到他的一位学生，说起高海林来，也证实了我的耳闻。行文至此，忽听一位同事说，高海林因心脏病突发，遽尔作古了！这位同事还说，高海林曾向他表示过，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悔恨，当时是真心相信他们是“反革命”。高海林说这个话的时候，已是耳顺之年了。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他为什么不能向周一良先生，坦坦荡荡，做一个同样的表示呢？

朋友！窥一斑而见全豹，原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妨用心思索一下，或许可以得出有益的启示。

道歉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了悔恨，想去道歉，这只是当事者要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条件作配合，才得完成。例如社会舆情、环境和气氛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台阶，有了它，当事者才好迈出第一步，还要让他迈得迈得自然而顺利，而当事者的另一方，也能受得顺利而自然，双方合拍，才能形成一个和谐局面。可由谁来搭建这个平台呢？谁该是这个平台的搭建者呢？我以为，社会舆情机构，如报纸、电视、出版社、学校以及他们的上级机构，责有攸归。社会舆情机构负有引导、创建社会和谐气氛的责任。四十多年了，这个台阶，非但没建，原有的几阶，好像还拆去了！这是不是社会舆情领导机构失职的地方呢！高海林固然勇气不足，没有把悔恨变为解脱，最后带着他的遗憾走了！可当年，他受社会舆情的蛊惑，伸手打了人；后来，又没有得到社会舆情应有的帮助，求得临终前的最后解脱。我们要问，他该负的责任有多大呢？

正是：山月几随杨公坠，顽石而今难点头。

注：

（1）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之句。

（2）见《北平和谈记实》，240页。董世桂、张彦之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又见《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145页，王宗仁、史庆冉著。华艺出版社，1991年。

（3）见《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北京

（4）同上，93页。

□ 原载《万象》

~~~~~  
【拒绝遗忘】

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 陶东风 •

7月5日晚，我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来首都师范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学生打老师的事实（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其材料大多来自她的惊世之作《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听了这个讲座我和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这些事实我虽然之前也有耳闻，但是这次可能因为配了图片、数据的原因，依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我个人以为，这些事实对于回答“文革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比任何所谓的“理论”都更具说服力。

但是意想不到的，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这个学生的这番高论使得我想起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彩论述。阿伦特说，意识形态是“从一个单一前提出发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其信奉者信以为真的各种主义。”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的逻辑”（ideology这个词由“观念”idea和表示“逻辑”的“-logy”这个后缀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让历史服从观念，让事实陈述服从逻辑演绎。这样，意识形态对于处在“逻辑法则”、“必然性”（这使我们想起“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口号“x x阶级必然胜利”、“x x主义一定要实现”等，它们都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法则”）之外的事实不感兴趣，它能够独立于经验事实而运作。对于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历史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推断和创造的东西，观念依据自身的逻辑运动。“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这样，意识形态思维就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坚持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它要让思想从经验中解放出来，它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

原来如此！这位同学大概就被极“左”意识形态控制而失去了对事实的兴趣，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良知。在他面前摆出再多血淋淋的事实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彻底麻木，做到对生命无动于衷，只对“总体性”“必然性”心醉神迷、坚信不疑、誓死捍卫。这真的让人对极“左”意识形态的迷惑力感到不寒而栗。在沉迷于意识形态的人看来，打的老师再多、死的人再多又有什么关系呢？“文革”的伟大意义在于其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的成功抵抗！在资本主义包围整个世界的情况下，“文革”成为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何等伟大！在饿死几千万同胞的情况下

我们的领袖为了支援“社会主义盟友”毅然把进口粮食送往别国，何等感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才是“总体性”视野！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在今天，极“左”意识形态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 摘自作者博客

~~~~~  
【研究动态】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 刘家驹 •

◇ 接受撰写林彪传任务，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未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 ◇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静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干、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

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 ◇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过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

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 ◇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闻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归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

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炎黄春秋》编后语：

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编者

□ 原载《炎黄春秋》2013第三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